

试析秘鲁民众主义发展的“悖论”

韩琦，宋欣欣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350)

摘要：秘鲁军队对阿普拉主义运动长期奉行敌视和打击的政策，但是1968年秘鲁军政府上台后，却继承和发扬了阿普拉主义的精髓，这是秘鲁民众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悖论”。这一“悖论”现象产生的原因，从浅层看是“特鲁希略事件”的积怨、寡头集团的阻挠，以及阿普拉党与军队性质的相互转变导致的。从深层看则是秘鲁现代化发展的迟缓、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成熟以及阿普拉党政策失误造成的。这一“悖论”现象表明，拉美民众主义运动是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产物，该时期的一些旧的社会经济发展瓶颈需要借助民众主义运动来打破。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 展的迟滞性决定了这个国家民众主义运动的迟发性、长期性和曲折性。

关键词：秘鲁民众主义；阿普拉；阿普拉主义；军人民众主义；贝拉斯科

肖枫先生曾经在《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与阿亚·德拉托雷》一文中指出，“拉美的民众主义首先在秘鲁‘开花’，但它并没有在秘鲁‘结果’，因为民众主义在秘鲁的实践并不成功”。^①可以说，到1968年贝拉斯科军政权上台前，以阿亚·德拉托雷（Vi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为首的阿普拉主义（Aprismo）在秘鲁的实践结果的确不如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主义（Cardenismo）、巴西的瓦加斯主义（Varguismo）、阿根廷的庇隆主义（Peronismo）等民众主义富有成效。尽管秘鲁阿普拉党人具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却一直未能取代寡头统治，建立起自己的民众主义政府。直到1968年贝拉斯科军政权上台之后，当年阿亚·德拉托雷提出的反帝反寡头的思想才较为彻底地变为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寡头统治联盟才得以摧毁。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民众主义发展的“悖论”，即长期具有保守倾向、并一直反对和敌视阿普拉主义运动的军队，在军政府期间却继承和实践了阿普拉主义的思想精髓，原因何在？关于秘鲁民众主义的研究，在国内学界仍是一个薄弱环节，至今尚无

收稿日期：2015-09-01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14JJD770012）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美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史；宋欣欣，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① 肖枫《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与阿亚·德拉托雷》，《拉丁美洲研究》，1982年第3期，第38页。

② 国外学者对秘鲁民众主义已有不少研究，典型成果如史蒂芬·斯泰因在《秘鲁的民众主义：民众的兴起与社会控制的政治》（Steve Stein, *Populism in Peru: The Emergence of the Masses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ontrol*,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0）一书中以1931年总统选举为切入点，对当时两种竞争性的民众主义力量——阿普拉主义和桑切斯主义进行了对比和研究；J. 克雷布特里在《新旧民众主义：秘鲁的案例》（J. Crabtree, “Populism Old and New: The Peruvian Case,”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19, Issue 2, 2000）一文中通过考察秘鲁的经典民众主义和新民众主义，强调1930-1980年代秘鲁存在延续民众主义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特点；胡里奥·科特勒在《政治危机和军人民众主义》（Julio Colter, “Political Crisis and Military Populism,”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6, Issue 5, 1970）一文中则研究了军人民众主义兴起的背景、主要内容和产生的各种矛盾。至于国内学界的研究，主要有肖枫的《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与阿亚·德拉托雷》（《拉丁美洲研究》1982年第3期）和董经胜的《1968-1975年的秘鲁军政权》（《山东大学报》1994年第2期）等。

人解释这一“悖论”现象。^②阿普拉主义与军人民众主义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悖论”现象?这一“悖论”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这些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阿普拉主义与军人民众主义

拉美的“民众主义”(Populismo)是在20世纪上半期出现的一种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和政治运动,其主要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农大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30年代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美国家正常的国际贸易被打断,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暴露出严重的问题,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和限制民众参与的政治体制遭到与日俱增的质疑,在此背景下,民众主义者提出反对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国家参与和推进经济发展,实行工业化、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动员工农参与政治等主张,并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众主义运动达到高潮,许多国家的民众主义领袖上台执政,如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府、巴西的瓦加斯政府、阿根廷的庇隆政府。秘鲁的民众主义政治始于20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阿亚·德拉托雷,他于1924年创建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简称“阿普拉”(APRA),即秘鲁阿普拉党的前身。^①而由阿亚提出的一整套具有拉美特色的民众主义理论和主张则被称为阿普拉主义。阿亚·德拉托雷由于少年时在家乡特鲁希略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接触的经历以及后来在圣马科斯大学作为学生与工人联盟的领导人,早就开始具有反寡头统治和反帝国主义的立场,^②1923年被莱吉亚政府流放之后前往墨西哥,期间创建了阿普拉,访问过德国、苏联,并逗留英国学习。1931年回国参加总统竞选,并亲自领导了秘鲁的阿普拉主义运动。

阿亚既是民众主义运动的政治领袖,也是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据肖枫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阿亚的民众主义思想体系经历了从最初的萌芽、创立、基本形成到最终的完成阶段,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包括“历史时空说”、“印第安美洲观”、“反帝国主义”和“经济议会”等。^③所谓“历史时空”说是一种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相对主义哲学理论,是阿亚坚持用美洲人自己的方式解决美洲问题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印第安美洲”概念,反映了强烈的大陆民众主义思想,他认为,印第安美洲国家的主要敌人,在外部是帝国主义,在内部是半封建的地主寡头,而造成国家落后的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拉美的现状是各种经济形态并存,阶级结构复杂。工人阶级人数不够多,政治觉悟也不够高,农民阶级技术和文化落后,中等阶级的各阶层常常受到更野蛮的剥削和虐待,是反帝斗争的先驱。因此,阿普拉党应该争取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建立一个中间阶级领导的多阶级联盟。他不同意“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判断,他认为,在工业化国家也许是这样,但对那些经济尚处于原始和落后状态的国家来说,帝国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因为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因此,阿亚认为在拉美国家,必须先建立以社会民主和各个阶级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保护下进行社会改革,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这个“反帝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是实行多党制的政治民主,在立法、司法、行政权之外,再增加一个建立在“全国经济议会”(由劳工、资本家和国家三方代表组成)基础上的经济权力机构实施经济权力。在社会方面将实行资源和工业国有化,保护工人权利,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免费教育等。

为了更好地指导阿普拉主义运动,阿亚在1926年他的代表作《什么是阿普拉》中提出了五条最高纲领,即反对美帝国主义(后改为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拉美政治上的联合;巴拿马运河国际化(后改为“大陆化”);土地和工业国有化;声援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和人民。阿亚明确规定了阿

① 阿普拉是一个国际性政党,在欧洲的巴黎、柏林、伦敦等地,以及在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古巴等地都建有支部。秘鲁阿普拉党(Partido Aprista Peruano, PAP)建于1930年9月21日。

②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胡毓鼎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五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5-646页。

③ 肖枫《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与阿亚·德拉托雷》,《拉丁美洲研究》,1982年第3期,第35-37页。

普拉的性质是拉丁美洲被压迫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反帝国际联盟。^①1931年8月阿亚回国竞选总统,这时需要有一个更为实际的、与秘鲁现实需要紧密联系的纲领,于是阿亚在8月23日的演讲中勾画出秘鲁阿普拉党的最低纲领,其要点是扩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保护本国工业,对矿业和石油业实行国有化,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政教分离,结束政府的腐败,创造一个有效的公共管理体系,等等。^②从阿普拉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不难看出,阿普拉主义运动是由中产阶级领导的、多阶级合作的反帝反寡头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它是适应秘鲁社会经济转型的需要而兴起的,也有学者将其称作“民众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运动。^③秘鲁阿普拉党很重视掌握工人运动,内部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并推行领袖至上。

但是,阿亚在1931年的总统竞选中失利,阿普拉党的某些激进分子试图用武力夺取政权,结果遭到保守政府的镇压,阿普拉党被迫转入长达20年的地下活动(1933-1945年和1948-1956年)。为了换取合法地位,有机会入阁,最终实现执政,阿普拉党逐渐发生蜕化,与保守集团达成妥协,很多激进的措施被搁置起来。虽然在短暂的间接参政时期(1945-1948年和1956-1962年),阿普拉党曾通过议会将其纲领的部分内容制定成法令,但这些法令很难在短期内产生重要影响。到贝朗德政府时期(1963-1968年),阿普拉党甚至与过去的对手奥德利亚分子合作,获取国会多数的席位,利用国会对政府内阁的不信任权和拨款权,破坏贝朗德进步改革的实施。

1968年10月,鉴于贝朗德政府改革乏力和与美资国际石油公司签订《塔拉腊协议书》时的妥协丑闻,以及全国大选准备的趋势表明阿普拉党有望赢得1969年的选举,于是,以贝拉斯科为首的秘鲁军官团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武装部队革命政府。军政府在政变前秘密起草的《印加计划》体现了“社会正义、大众参与、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的原则,^④其中强调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军政府认为,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的最基本问题是分裂和不发达,原因在于对外国资本的依附和强大的寡头集团的统治。秘鲁的出路在于消除“外国帝国主义的飞地”,将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转变成为一种自主的经济发展模式。^⑤根据军政府制定的《秘鲁1970-1975年五年经济计划》,反帝反寡头战略的目的是实现国家对经济剩余的控制,并将其转移给原先被边缘化了的当地企业家部门。该计划的制定者相信,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由于外国资本家和寡头不愿进行再投资以促进经济的充分增长和发展,秘鲁已经深受其害,因此,打破资本垄断有助于带来投资高潮,恢复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力,而结构改造和国家作用的扩大将是导致这种活力的必要机制。这一经济计划的实质是以混合经济取代自由放任,以进口替代工业化取代出口导向战略。用贝拉斯科的话讲,就是要建立一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⑥

贝拉斯科军政府为贯彻其反帝反寡头的战略,强力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主要包括:将美资国际石油公司、塞罗德帕斯科公司等外国垄断企业收归国有,从1968年至1975年,军政府共征收和没收17家外资大公司或企业,收回3100多个矿山租让地。^⑦在石油、矿业、渔业和电力等部门建立国营公司。到1975年,新建国营企业达到150个,就业人数达67万人。^⑧1969年6月24日

① Haya de La Torre, "What is the APRA," in Robert J. Alexander ed., *Aprismo: The Ideas and Doctrines of 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97-101.

② Steve Stein, *Populism in Peru: The Emergence of the Masses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ontrol*, p. 163; Charles D. Ameringer, *The Socialist Impulse: Latin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9, pp. 110-111.

③ Matthias Vom Hau, "Contested Inclus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ationalism in Mexico, Argentina, and Peru," Dissertation of Ph. D. Brown University, 2007, p. 349.

④ Raul P. Saba,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n Peru*,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7, p. 58.

⑤ Peter F. Klarén, *Peru: Socie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nd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40-341.

⑥ Peter F. Klarén, *Peru: Socie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ndes*, p. 343.

⑦ 苏振兴、徐文渊主编《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页。

⑧ Peter F. Klarén, *Peru: Socie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ndes*, p. 343.

颁布土地法，实行土地改革，旨在消除旧的大庄园主和土地寡头，到土改完成时，大约有 2300 万英亩的土地分配给了 37 万个受益者。秘鲁的土改被认为是拉美最广泛的土改之一，甚至超过了墨西哥和古巴。^①同时还颁布《工业总法》、《矿业总法》和《渔业总法》，成立工业社、矿业社和“社会所有制”企业，企图通过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利润分成来消除劳资冲突、缓和阶级矛盾。为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地参与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中，1971 年军政府还建立了一个“全国社会动员体系”（Sistema Nacional de Movilizacion Social），负责对农业合作社、工业社区和新兴市镇中的民众进行组织和动员。军政府通过对利马和其他城市郊区的“擅自占地者”提供产权以及将他们纳入“全国社会动员体系”的管理之下，到 1974 年，已经将大多数城市周边贫民窟的外来移民安置在了国家指定的“年轻市镇”中。政府还通过颁布《教育改革法》扩大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并宣布秘鲁是双语国家，印第安人的克丘亚语为第二官方语言。^②在对外方面，军政府奉行民族主义和不结盟外交政策，捍卫 200 海里海洋权，促进拉美和安第斯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与苏联、中国与古巴的关系。1971 年 11 月 2 日与中国正式建交。

从军政权的计划纲领和它实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看，军政权的性质是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的，军政权对秘鲁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它的反帝反寡头的斗争目标正是由阿普拉党最早在 30 年代提出来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是军政府“盗用”了阿普拉主义运动的灵魂。^③尽管军政权的体制使它超越并排斥各个政治党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与民众的密切联系，贝拉斯科将军也没有阿亚·德拉托雷那样的领袖魅力，但是，军政府的“全国社会动员体系”具有墨西哥卡德纳斯的职团主义特征，军政府通过解决就业、土改和安置贫民窟移民所体现出来的分配政策具有民众主义特点。阿普拉主义与军人民众主义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延续性：阿普拉主义奠定了军人民众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而军人民众主义则从实践上体现了早期的阿普拉主义。

二、民众主义发展“悖论”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尽管秘鲁阿普拉党人具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但阿普拉主义运动一再遭受挫折。直到 1968 年贝拉斯科军政权上台之后，当年阿亚·德拉托雷提出的反帝反寡头的思想才变为政府的政策，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为什么阿普拉主义运动长期受到军队阻挠？为什么又是当年反对阿普拉的军队最终践行了阿普拉主义思想？

首先，阿普拉主义运动的发展长期受到军队的压制，特鲁西略事件的积怨是重要根源。事件最初起因于 1931 年总统选举。当时秘鲁出现了两股民众主义的代表，分别是年轻军官桑切斯·塞罗（Luis M. Sánchez Cerro）领导的桑切斯主义（Sánchezcerrismo）和阿亚领导的阿普拉主义。这两股运动都充满了强烈的个人主义和领袖魅力的色彩，都想要实现 1931 年总统竞选的胜利，为了争取选票，他们猛烈攻击对方。寡头集团认为阿普拉党威胁更大，选择了支持桑切斯·塞罗。后者最终赢得了 1931 年的选举。阿普拉党对这种选举结果提出质疑。阿普拉党的代表先是在国会中干扰政府的活动，为了抵消阿普拉党的威胁，桑切斯·塞罗依靠极右势力（甚至有法西斯分子）的支持，逮捕阿普拉党代表，这加剧了阿普拉党与桑切斯·塞罗的对抗活动。阿普拉党对桑切斯·塞罗进行了人身攻击，强烈谴责桑切斯·塞罗的军国主义，反对政府提高军队福利和增加军费开支的措施。除了口头和文字的攻击外，阿普拉党的斗争还升级为街头暴力、政治暗杀和武装暴动等。特别是在 1932 年 7 月的特鲁西略事件中，阿普拉党人占领军营，残忍地杀害了 34 名军官。而军队平息暴动后，出于报复，血洗特鲁西略城，处决了 1000 多名阿普拉

① Daniel M. Masterson, *The History of Peru*,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9, p. 175.

② Michael Reid, *Peru: Path to Poverty*, London: Latin America Bureau Limited, 1985, p. 50.

③ Charles D. Ameringer, *The Socialist Impulse: Latin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17.

分子。^①这次事件造成了军队与阿普拉党的永久裂痕，“只要军队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阿普拉分子就很难希望取得政权”。^②只要阿普拉党取得合法地位，秘鲁军队总会插手干预它参与总统竞选。^③

其次，寡头政权的阻挠是根本原因。30年代的军队是现存秩序的维护者，是寡头政权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它对阿普拉党的仇视也源于寡头集团对阿普拉党的诅咒。此时秘鲁的寡头集团^④势力仍然很强，在经济上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政治上，能够施展政治手腕，通过拉拢和镇压两手来对付阿普拉党的挑战。在寡头集团内部两大政治派系中，由普拉多为首的左翼通过选举攫取了两届总统的职位（1939—1945年、1956—1962年）。普拉多政治活动的特点是对阿普拉党持相对调和的立场，通过物质利益的让步（增加工资、建设公共工程、对食品补贴等）换取他们的支持。但是，寡头集团的右翼对阿普拉党则持冷酷无情的态度，在贝纳维斯德将军的极权统治时期（1933—1939年）和奥德里亚将军统治时期（1948—1956年），阿普拉党均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因此，与其说是军队压制阿普拉党，倒不如说是寡头集团阻挠阿普拉党。

第三，阿普拉党与军队立场的相互转变，为军人民众主义继承阿普拉主义创造了条件。阿普拉党在经过30年代早期武力夺取政权道路的失败之后，选择了议会道路，但长期处于非法地位，从40年代中期开始，党内的机会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为了换取合法地位和实现执政，阿普拉党逐渐发生了蜕化，它与保守势力达成了妥协。阿普拉党的向右转造成了党内的分裂，也流失了很多过去的和潜在的追随者。它甚至支持军队镇压农民暴动。^⑤到50年代中后期，阿普拉党已经丧失了民众主义运动领导者的作用，很多激进措施也被搁置起来。

同时，军队也在变化。过去军队作为保守机构是寡头政权的维护者，其功能是对外防御，对内镇压民众的暴动。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军队内部出现了一些进步的因素：（1）军官的社会构成趋于下层化。原来的军官多来自上层阶级，而现在出身于中、下层的军官增多（如贝拉斯科就是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们对社会现实有比较深刻的体验，迫切希望改变现状；^⑥（2）军人的觉悟有所提高。在贝朗德政府期间，军队参与了修筑公路、机场、医院以及诸如扫盲和医疗等爱国主义的社会活动，使他们了解到国家社会贫困的严峻现实。特别是60年代初，军队参与镇压游击队的经历使他们看到了农村落后的土地制度和社会不公，他们意识到深刻的社会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是游击队敲响了让军队认识国家现实的警钟”；^⑦（3）随着军队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军官们更加关心社会政治问题。1950年秘鲁建立了高级军事学院（CAEM），军官们除了学习军事知识外，还涉及经济和社会学内容，特别是与发展政策有关的突出问题。不仅研究理论问题，而且还参与制定改革计划；（4）军队逐渐形成了新的“国家安全观”，即不再仅仅从严格的地理和军事术语理解国家安全问题，而是把国家安全同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要求实施彻底的结构改革，并认为军人应该对发展负责。“没有发展就没

① Steve Stein, "The Paths to Populism in Peru," in Michael L. Conniff ed.,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9, p. 106.

② [美] 弗雷德里克·B. 派克著，辽宁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秘鲁近代史》下，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4页。

③ 1962年阿亚以微弱多数赢得总统竞选，但需由国会投票表决，军队发动政变取消了选举。这次政变也影响了1963年的总统选举。再到1968年总统选举，当秘鲁国内谣传阿亚有可能当选总统时，贝拉斯科领导革新派军人适时发动了政变。

④ 寡头集团是指农业出口寡头、山区大庄园主与外国资本结成的传统的政治联盟，当时的主要代表是与美国资本相结合的大资产阶级，即所谓“40家集团”。

⑤ Grant Hilliker,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Peru: The Aprista and Other Mass Parties of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p. 58—64, 74—102.

⑥ Julio Colter, "Political Crisis and Military Populism,"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6, Issue 5 (1970), pp. 112—113.

⑦ Cynthia McClintock and Abraham F. Lowenthal eds., *The Peruvian Experiment Reconsider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50.

有国家防御”。^①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军队越来越看清了秘鲁的社会现实，逐渐意识到过去阿普拉党提倡反帝反寡头、实施印第安人土地改革、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和维护经济主权等民众主义改革的正确价值，倾向于实行军人民众主义政策。

因此，当阿普拉党为了现实的政治利益，调低了革命的调门，选择与保守集团合作，越来越违背民众主义改革呼声时，秘鲁的军队则发生了进步的转变，越来越站在保守集团的对立面。可以说阿普拉党与秘鲁军队立场的相互转变，为军人民众主义继承前期阿普拉主义的精髓创造了条件。

三、民众主义高潮为何姗姗来迟

与同期拉美其他主要国家（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的民众主义运动相比，秘鲁的阿普拉主义运动兴起的时间不算晚，理论体系也相当成熟，但民众主义高潮却姗姗来迟，并且最终是以军人民众主义政权实现了阿普拉党的最初目标。其原因何在？这一高潮的最终到来又说明了什么？

第一，秘鲁的工业化水平总体不高，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社会动员受到限制。

从19世纪“鸟粪繁荣”以来，秘鲁长期维持着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大萧条之前，秘鲁的出口产品包括沿海地区生产的蔗糖、棉花、石油，中部山区出产的羊毛和白银，东部林区出产的橡胶，这种多样化产品的出口，在其他拉美国家是少见的。初级产品出口的多样化，延长了初级产品出口的模式。虽然在1895—1907年秘鲁曾出现过出口带动的早期工业化，但时间很短暂。大萧条之后，秘鲁在曼努埃尔·普拉多总统的第一任期（1939—1945年）也曾经进行过工业化的尝试，但很快被美国大量战略物资和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冲淡了。关键是“出口产业资本家与外资的结盟左右了政府的决策，使这种政策形成有利于出口部门，其他经济部门则受到忽视”^②，由此延缓了秘鲁向进口工业化模式的转型，这从根本上造成了传统寡头的势力强大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弱小。

阿亚在20世纪20年代所提出的阿普拉主义，主要是受到当时国际革命形势、特别是墨西哥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潮的影响，并且是建立在对拉美地区经济政治整体发展状况和革命形势的判断上，而当时秘鲁社会现实离实现民众主义目标仍有较大差距，民众动员尚限于局部地区和部分阶层。尽管1931年宪法实行了选举制改革，秘鲁的选民规模增加了59%，从1919年的203 882人增长到323 623人。^③但是秘鲁的选民占全国总人口（约550万）的比例极小，大量印第安人因为识字问题被排斥在选举之外。直到50年代中期，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初步发展，^④城市化的加速，道路和通信网络的形成，秘鲁的政治动员才囊括了所有地区和各个阶层，民众主义目标实现的时机才逐渐成熟起来。

第二，民众主义运动处于分裂状态，未能形成全国性民族民主统一阵线。

自然地理将秘鲁分为沿海、山区和林区三个呈纵条状分布的区域，在殖民地时期，这种分割还表现在种族方面，即山区是属于印第安人的，沿海是属于西班牙人和印欧混血人种的。这种地理和种族文化“分裂”的殖民地遗产在19世纪因沿海资本主义出口经济的发展而被加强，到20世纪初，形成了山区封建制、土著共产主义残余和沿海资本主义三种经济形态，^⑤伴随这种经济结构的多元性是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和政治民主制度的薄弱，由此带来国家整合中的困难。全国“分裂”的状态也影响到了民众主义运动。

① Raul P. Saba,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n Peru*, pp. 37—39.

② 韩琦《秘鲁现代化迟缓原因探析》，《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第87页。

③ Peter F. Klarén, *Peru: Socie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ndes*, p. 269.

④ 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出口迅速扩大和利马城市人口增加带来的市场扩大，带动了制造业增长，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50年的14%上升到了1960年的17%。这表明秘鲁“从50年代中期明确转向了进口替代”。参见[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徐壮飞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392页。

⑤ [秘鲁]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著，白凤森译《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页。

首先是阿普拉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分裂。秘鲁阿普拉党和共产党最初所提出来的革命目标都是反帝反寡头，阿亚和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曾同为《时代报》的记者，1919年共同反对莱吉亚的独裁统治。在阿亚被流放之后，马里亚特吉接管了阿亚所开创的“民众大学”。但自1927年起，阿亚的思想就由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改良主义，1928年与马里亚特吉正式决裂。当马里亚特吉领导的共产党在1929年成立秘鲁总工会时，阿亚领导的阿普拉党以利马和北部沿海甘蔗种植园的工人为基础，建立了秘鲁工人联合会。在1960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秘鲁工人联合会在有组织的劳工中居于主导地位。两个对抗的劳工组织的存在，严重地削弱了工人阶级同寡头势力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力量。

其次是代表中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之间的分裂。20世纪50年代，随着秘鲁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都有较大提高，到60年代初，中产阶级已经占秘鲁人口的15%，在秘鲁沿海还出现了农村中产阶级。当1956年大选临近时，秘鲁又出现了新一轮反寡头的政治动员，这次动员的主要力量来自两个新党，即人民行动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人民行动党主张包括国家计划化、工业化、土改等内容的技术专家治国的发展模式，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但阿普拉党支持寡头左翼普拉多，挫败了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贝朗德。在1963年大选中，当阿普拉党竞选总统职位再次受挫后，又与其先前的敌手、寡头集团的右翼奥德里亚将军在议会中结成联盟，有效地阻止了新政府的许多改革计划。

可见，直到1968年军人政变，秘鲁的反帝反寡头的民众运动始终处于分裂状态，未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第三，阿普拉党群众基础的局限性和政治策略的失误。

阿普拉党群众基础的局限性及其政治策略的失误是延缓寡头政权倒台以及将民众整合到新的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阿普拉党没有真正代表大多数秘鲁民众的利益诉求。虽然阿普拉党是秘鲁的“民众党”、“多数党”，但不少学者认为它只是一个“地区党”、“劳工党”。^①阿普拉党号召建立一个中间阶层领导的多阶级联盟，但它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得到较大发展的北方蔗糖和棉花种植园等地寻求支持。^②从地区分布来看，阿普拉党在北部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巩固的北方”（Solid North）。至于中南部高原和山区，阿普拉党并未取得显著的优势。另外，阿普拉党也没有及时吸纳新兴中间阶层和民众力量（特别是城市贫民区居民）的支持。

其次，从阿普拉党的政治策略看，当20世纪30年代初秘鲁第一轮民众主义大动员到来时，面对桑切斯主义的强势竞争，它本可以先与保守集团、军队合作，消除它们的疑虑，实现联合执政的目的，然后逐渐实现阿普拉主义的改革主张，最终上台执政。因为当时阿普拉主义在绝大多数保守派和军队的眼中等同于共产主义，被视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新的土地精英—城市资产阶级联盟的威胁。^③但阿普拉党在1931年总统竞选失利后，却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结果造成了与军队不可弥合的裂痕。另外，阿普拉党或许可以利用1931年宪法的规定，通过改革选举法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如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代表伊波利托·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公民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先例。作为反对派领袖，伊里戈延在发动了几次不成功的小范围暴动之后，改变了策略，将关注点转向阿根廷的选举制度。面对保守派操纵选举和选票的局面，伊里戈延采取了“弃权、不合作”的策略，最终迫使政府通过了1912年培尼亚选举法。新选举法规定18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一律参加无记名投票。^④因此，在阿普拉党控制全国1/3左右选票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迫使政府进一步修改选举法，取消识字要求的限制，从而争取印第安人的选票。此外，如果阿普拉党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接受贝朗德的合作要求，与人民行动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结成联盟，形成一个反帝反寡头

① Grant Hilliker,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Peru: The Aprista and Other Mass Parties of Latin America*, pp. 74 - 102.

② Robert H. Dix, "Populism: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20, No. 2 (1985), p. 37.

③ Stephen L. Rozman,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Peruvian Milita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12, No. 4 (Oct., 1970), pp. 551 - 552.

④ 潘芳 《探析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理论》，《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

的全国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也许民众主义高潮会更早到来。

尽管秘鲁民众主义运动发展曲折，历时长久，但民众主义力量始终在集聚和成长。当阿普拉党向右转，人民行动党政府改革乏力之时，一度保守反动的军队却转变为秘鲁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的进步力量，践行了阿普拉主义最初提出的任务，推动了民众主义高潮的到来。这种民众主义发展的“悖论”现象说明民众主义运动是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产物，它肩负着现代化转型所赋予的特殊使命，秘鲁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瓶颈需要通过民众主义运动来打破。在拉美几个主要国家，民众主义高潮先于秘鲁到来。据奥唐纳的研究，30年代大危机之后，在巴西和阿根廷先后出现了一个民众主义联盟，其反对旧的寡头统治集团、外资企业和自由贸易政策，支持工业化和拓展国内市场。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国内消费品市场，适当增加了工人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弱小，为了对抗传统的寡头势力，也不得不与工人结成联盟。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扩展，“旧统治者们已经被取代，对外依附的纽带已经被切断，民众主义联盟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在取得与其期望大体相配的报酬”。^①秘鲁的民众主义运动实质上是软弱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需要联合民众阶层的力量共同推翻以沿海出口农业寡头、山区半封建的大庄园主与外国资本联合的寡头政权、实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自主性发展。这是一种在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转换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目的是消除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结构性障碍，寻求秘鲁国内各阶层之间、以及本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平等。贝拉斯科军政权的改革，摧毁了农业出口寡头、山区大庄园主与外国资本结成的传统的政治联盟，寡头集团及其金融机构的影响被大大削弱，社会政治权力从传统寡头手中转向工矿企业家、技术专家和民众组织（工会、农业合作社）手中。尽管军人改革仍有较大局限性，但它冲破了秘鲁的传统结构，从而推动了秘鲁现代化的前行。秘鲁案例对于理解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民众主义运动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宋 鸥

A “Paradox”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ruvian Populism Movement

HAN Qi , SONG Xin - xin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 Nankai University , Tianjin , 300350 , China)

Abstract: A “paradox”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ruvian populism movement is that the army has been historically opposing the Aprista Movement , whereas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General Juan Velasco Alvarado (1968 - 1975) inherited the essence of Aprismo. The causes on the surface include the military’s enmity toward APPA resulting from Trujillo events , the obstruction of oligarchic group ,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PRA and the army. However , the underlying causes are the slow pace of modernization , the immaturity of the bourgeoisie strength , and APRA’s mistakes in policy - making. This paradox indicates that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is a product of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during which populism is needed to overcome some old bottleneck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delay of a country’s social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 leads to a delayed , long and tortuous path of populism movement.

Key words: Peruvian Populism; APRA; Aprismo; Military Populism; Juan Velasco Alvarado

^① [阿根廷] 吉列尔莫·奥唐纳著，王欢、申明民译 《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3 - 46 页。